

●朱大可

魔都记忆：从庇护所到嘉年华

在喜马拉雅美术馆“上海，你好”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

时间：2015年12月7日

地点：浦东图书馆一楼报告厅

很高兴在这个地点、喜马拉雅美术馆和上海浦东新区图书馆两个地标性机构里，来讨论关于上海的话题。跟刚才两位都不太一样，我是出生在上海的，但我是个地道的异乡人，我是出生在上海的外地人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刚才两位所介绍的上海对我来讲，其实又新鲜又陌生，我从中学到了不少新东西。上海千变万化，它就是一个魔方。说的好听点叫魔方，说的难听一点，那就叫魔都。魔就是变幻，它让我们捉摸不定，所以在我们的记忆中，经常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时空错乱，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那样。那么，我们又该如何整理我们的历史记忆呢？

我今天的话题题目叫“魔都记忆，从庇护所到嘉年华”，在讲这个话题之前我先要提一个词，就是“老克勒”，不知道在座的年轻朋友，你们知道这个词吗？什么叫“老克勒”，就是那种对于上海殖民地文化极度崇拜的社群，这些人现在绝大部分已经离我们而去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，是一个叫徐元章的老克勒，他是前年的年底去世的。为了捍卫自己在宝庆路上的花园住宅，每个周末都在自己家举办舞会，因为这个住宅马上要被拆掉。他用舞会来吸引媒体关注，并向政府提出抗议。但他的生命无法跟这个强大的力量抗衡。房子还没有拆掉，他自己的命就被先被拆掉了。

徐元章的去世，带走了整整一代关于老克勒的历史记忆。我曾经看过一个上海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，说老洋房就要拆掉了，房子的主人都在海外，只有一个老男人作为家族的代表，一直留守在这座老洋房里。他通宵未眠，守望这最后的时刻。在拆房的黎明即将到来之前，他做了一个告别仪式，就是找了一个玻璃杯，用筷子慢慢调出一杯苦涩的咖啡，就这么把它喝下去了。这就是他聊以自慰的饮品。咖啡，代表了殖民地时代的最后记忆。

无论在施蛰存还是穆时英的小说里，淮海路总是洋溢着咖啡和罗宋汤的双重香味。气味是比其他事物更能激发记忆的东西。这是殖民地记忆的重要特点。下面我想把这种记忆放大到一个更大的空间里来讨论，也就是从文明和文化的角度来讲一下上海的历史本质。

文明和文化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，在一些西方的学者的著述里面，比如亨廷顿在谈论“文明的冲突”的时候，讲的是儒教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，但他混淆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那不是文明的冲突，而是文化的冲突。

文明跟文化最大的区别，就是文明更注重物质的层面，而文化更注重精神层面。190年鸦片战争的意义在于，它宣告了中华农业文明的衰败和死亡。然后，上海作为五大通商口岸之一，就成了西方工业文明在中国的第一个城市投影。这场文明投影的过程长达100多年，在毛泽东时代有过二十多年的中断，而经过邓小平“改革开放”的推动，现在已经覆盖整个中国。今天的中国文明，就是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投影，而上海是它当年投影的第一站。这就是上海的历史意义，它扮演了历史里程碑的重大角色。

不仅如此，上海还投影了西方文化，投影了西方的人文精神和自然科学。上海商务印书馆当时进行全面引进，以文库形式，推介西方自然科学、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。此前没有任何机构做过这类工作。你们会发现，这是一种双重投影——文明和文化的共同投影，由此在上海形成一个全新的体系。这个体系有一种意外和特殊的功能，就是它把租界弄成了远东最大的庇护所。

这个自由的空间究竟庇护过些什么人呢？它首先庇护了在太平天国大屠杀情况下整个太湖地区的乡绅，他们带着细软逃到上海，成为上海崛起的最重要的商业力量；它也庇护了那些激进或者温柔的外省文艺青年，像丁玲、萧红、萧军、当然还有聂耳。

成名的作家更是如此。鲁迅从北平逃到厦门，从厦门又逃到广州，从北洋政府逃到国民政府的怀抱，结果发现不对，再从那里逃到上海，选定虹口日租界作为最安全的庇护所，有时在家里还觉得不够安全，干脆躲到日本人的旅馆里，因为那里有民兵巡逻。还有那些图谋造反的“思想犯”。要是没有这个庇护所，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。中共一大、二大、四大都在上海召开。就连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构，也一度设在上海。各种思想，无论是激进的左翼革命思想，还是自由主义思想，甚至是无政府主义思想，在上海都成长得很好。这是关于庇护社会精英的故事。

上海同时也庇护过那些最底层的、来自安徽和苏北的难民。他们在上海变成了码头苦力、黄包车夫，澡堂子里的敲背师傅、扦脚师傅、理发店的理发师傅、马路上的扫地工、掏粪工，等等，等等。他们承包了这座城市里所有的脏活累活。

更有趣的是，在国际舞台上，它还庇护了两万犹太人和两万白俄。没有这种庇护，租界的发育和繁荣是不可思议的。法国租界当时只有几百位发过侨民，怎么打造法租界呢？俄国人一来，问题解决了，因为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，也就是开明专制时代，俄国人已经做好了全盘法国化的文化准备，并且在19世纪迎来俄罗斯文化的黄金时代。这些俄国贵族，具有良好的欧洲文化素养，所以他们进来以后，立刻跟法租界结合，成为它的实际主人。法租界最主要的马路是淮海路，那时候叫霞飞路，路边的法国餐厅很多实际是俄国人开的，俄国的罗宋汤占领这条马路，在跟巴黎香水混合之后，成为上海最时尚的城市气味。他们跟后来的犹太人一起，为上海的文学、音乐、美术和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我们可以看到，庇护所安放了那些无家可归的灵魂。那么它的基本的特性是什么呢？首先是宽容。上海的公董局没有设立什么文化处来专门管制文化，但文化就这么自由发展起来了。宽容制造了自由的空间，形成文化的多元化生态，各种思想鲜花和精神杂草，都可以在这里获得自己生长的土壤，结果形成了一个盛大的繁华气象。我在同济开了一个课程叫“二十世纪中国风尚史”，这课程在民国时期就讲三个城市，第一个城市是北平，讲的是1917年到1927年，北平的黄金时代，1927年大屠杀出现后，北平的知识分子全部南下跑到上海来了，上海开始繁荣起来，一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。就在这个十年里，上海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黄金时代。

1937年以后，上海被另外一个城市代替了，你们知道哪一个城市吗？1937年到1947年，第三个城市是延安。上海这个庇护所是被两个东西终结的，一个是日本人，1932年到1937年两次大轰炸，以及后面的占领，彻底摧毁了上海的工业和文化根基，尤其是1937年的大轰炸，把整个商务馆全部炸掉，炸到什么程度？印刷厂的铅字熔解，流到地下，把整个自来水管系统全部堵塞，而整个上海天空飘浮的，则全部都是纸的黑色灰烬。

日本人非常清楚中国的灵魂在什么地方。中国人走向现代化和自我复兴，就指望闸北了，民族现代工业是它的文明根基，而商务印书馆是它的文化轴心。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终结者。另外还有一个终结者。我要举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剧，叫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，后来还拍成了一部同名电影。据说它以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作为原型，讲一队解放军哨兵进驻了这个光怪陆离的、代表资产阶级香风毒雾的南京路，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商业样本。

解放军士兵所代表的乡村生活方式，跟南京路所代表的先进文明的生活方式，在电影里发生了某种冲突。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外部投影文明跟它原址的旧文明之间，出现了某种深刻的失调。如果能够揭示这种差异给士兵带来的生活困惑，这本来应该是一部好电影，结果被彻底弄拧巴了。在话剧或电影里，他们把先进和落后的两种生活方式的冲突，上升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博弈，最后再上升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博弈，通过两层逻辑推导，凭空制造了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。

这种所谓的阶级斗争叙事，终结了上海作为庇护所的伟大使命。在庇护所被关闭之后，只有一次回光返照，那就是1985到1986年的席卷全中国的文化开放运动，上海有幸参与到这场运动当中，并且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无论是前卫还是后卫文化，上海的表现都很牛逼。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，从后卫的角度来讲，第三代导演和第四代导演一起崛起，其中第四代导演杨延晋的《小街》，吴贻弓的《巴山夜雨》和《城南旧事》，都是当时的电影杰作，现在有吗？Nothing。

上海电影现在是什么状况呢？他们不顾政协委员的强烈反对，把拍过那些电影杰作的摄影棚全部拆掉，然后在废墟上盖一座豪华大楼，里面放一个电影博物馆。那就相当于，你杀掉一个承载文化记忆的老人，却用一个劣质的电影骨灰盒来取而代之，这玩得究竟是哪一出市场魔术呢？

回顾这段历史，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，就是上海现在变成文化嘉年华的大城，每年我们都拥有很多文化节日，这两天上海正在举办国际电影节，还有国际茶文化节，服装文化节、音乐节，艺术节，还有国际艺术博览会，各式各样的文化节日，看起来热闹非凡。

但是 you 仔细想想，就会发现里面还是有很大的问题，因为所有的节日都只是一场集会，讲的更出格一点就是集市。大家都知道集市是什么玩意儿了，各地来的人，在这里摆一个摊卖东西，卖完了以后走人，留下的是什么呢？一地鸡毛而已。我们有能力把这些集市产品转化为本土的原创力吗？没有。所以嘉年华看起来很热闹，但它不创造任何东西。我们现在完全沉浸于这种嘉年华的狂欢之中，却忘掉了嘉年华的真正目标——它应当成为推动原创的摇篮，而多少年过去了，这个原创机制，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。如果我们不能修复庇护所式的原创生态，不能重建宽容的文化管理方式，那么指望让上海重返30年代的文化黄金时代，只能是一场梦遗而已。

上海不需要嘉年华，上海只需要庇护所。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基本观点。面对日益沙漠化的局面，作为一个研究者，我所能做的，只是帮助大家修复记忆，并以这种庇护所记忆作为起点，给文化复苏指出一条生路，那就是宽容。宽容可以生成自由的文化生态。宽容是一条最基本的底线，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，文化繁荣就只能免谈了。谢谢大家！